

论闽台宗族乡土意识中的亲和力与排他性

方宝璋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闽台民间具有厚重的宗族乡土意识, 通过修谱、标榜郡望、堂号, 修建祠堂、宗庙、会馆, 举行祭祀、合食会食、迎神赛会等活动来体现亲和力, 进而团结、帮助、保护同族同乡之人; 其负面作用是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各宗族、地区产生分裂和对立, 甚至发生械斗。闽台宗族乡土意识源于小农经济, 历史上的移民特征, 使之更为强烈。当今我们应该因势利导, 趋利避害, 让宗族乡土意识为和平统一的祖国大业服务。

关键词: 闽台; 宗族乡土意识; 亲和力; 排他性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72 (2003) 01-0080-05

(一)

闽台民间具有厚重的宗族乡土意识, 他们从传统的同宗同乡关系, 即亲缘和地缘关系、进行认同整合。这种认同整合的手段就是通过溯渊源、分疏亲的修谱联宗、标榜郡望、堂号, 修建象征同宗同乡的祠堂、宗庙、同乡宗亲会馆, 举行祭祀、合食会食、迎神赛会等活动, 来体现其凝聚力、亲和力, 进而团结、帮助、保护同族、同乡之人。

闽台宗族意识强烈的一个重要表现是, 绝大多数氏族都重视历代不断修谱、续谱, “一世不修谱为不孝”^[1]。闽台在不同时期都曾经历过移民社会, 移民离乡背井, 视族谱尤重, 未敢须臾忘怀自己出身何族、来自何处。闽台族谱、家谱等编撰体例、内容种类很多, 繁简不一, 但有一突出特点就是努力追寻本宗族的水源木本。在这种追寻中, 尽管血缘、流派千枝万叶, 鱼龙混杂, 真伪参半, 但都认同于炎帝、黄帝, 归根结蒂都是炎黄子孙。如台湾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十大姓在其族谱中对其族源的追溯, 完全是抄自福建的同姓族谱, 而其中有的台湾族谱, 则是直接从福建等地带过去的。因此, 闽台族谱出自一辙, 共同信奉同一祖先。^[2]

闽台诸多家庭都认同于炎黄子孙, 那么同姓同宗固然血浓于水, 异姓异宗追根溯源也是血肉相连。因此, 闽台不少家庭在不同的范围内, 重新进行整合, 即数姓甚至数十姓开展异姓联宗活动。如著名的柯、蔡二姓联宗, 就是依据族谱所载柯氏为周太王古公亶父次子仲雍之后, 蔡氏为周太王幼子季历之后, 均出自姬周, 故相互认同联宗。目前, 台湾成立“济阳柯蔡宗亲总会”, 其分会分布在香港、新加坡、日本、菲律宾、泰国、缅甸、

美国等地。更有甚者, 目前台湾所组织的宗亲会、恳亲会等, 在更遥远的祖先血缘中, 把更多的姓氏联络起来。如“至德宗亲会”就是联络都认同于姬周氏这一共同祖先的三十余个姓氏, “至孝笃亲舜裔总会”则把对帝舜后裔认同的陈、姚、虞、田、胡、袁、陆、车、夏、王诸姓联络起来。^[3]

为了使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上下有序, 辩明辈分次第, 历历可查, 闽台的许多家庭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度, 即在同一辈分的族人中, 名或字必须用某一个统一规定的单字, 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 以示区别。这不仅使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和上下伦序关系分明可辨, 而且还有助于联络不同区域内的同宗远支族人的血缘感情。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庭, 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 进行“联谱”活动。福建省全门县, 历史上隶属泉州同安县, 蔡氏家庭的子孙分居同安县新店乡和金门的枫林村, 两地蔡氏沿用同一排行用字, 即“景太靖延用启乔, 汝土复根柱基铨, 淑熙梁培铸洪财, 珍海棠荣远仓喜”。^[4]故 1949 年后虽隔数十年不通音讯, 近年重聚一对辈行用字, 便可分明尊卑亲疏, 寻根问祖。

闽台不少家庭在移居地为标榜自己的渊源流派, 以示饮水思源, 不忘宗亲故土, 把本家庭的郡望、堂号作为祠堂、家庙的牌匾, 而且往往镌刻于民居的门匾或门楼上。如刻有“颍水世译”、“江夏衍派”、“鲁国传芳”等字样, 以表明郡望, 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还有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 更清楚地昭示了各姓氏的家世。如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 “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 叙述了该姓入闽流播的时代和路线: “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 簪纓世代; 入闽而德(化)、而永(春)、

收稿日期: 2002-02-01

作者简介: 方宝璋 (1951-), 男, 福建莆田人,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区域文化、审计史研究。

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初”。在闽台，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直观的文化景观，体现了闽台各家庭孜孜而求于家族的渊源，强烈的宗亲故土观念。

闽台宗族乡土观念所产生的凝聚力与亲和力在两地地名中也有明显的反映。闽南乡村多聚族而居，“以姓名乡”的习俗十分普遍。如福建省晋江县初步统计，大约有60个姓氏，分别冠于170个左右的村庄地名之中。^[9]这些村庄地名大多数以村庄的开基者姓氏或以此地大族的姓氏加以命名。闽南人移居台湾后，大部分人按祖籍聚居。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不忘祖地故土，继续维系“乡族感情”，他们把开垦定居的地方以故乡旧名来加以命名。如今日台湾地名之中，以泉州为名者共有9个，其中5个称为泉州厝；以同安为名者7个，其中4个称同安村，3个称同安厝；还有3个兴化寮、2个兴化廓、2个安溪村、2个安溪厝、2个永春村等等，不一而足，兹不赘举。^[10]

闽台民间普遍相信风水说，祖墓关系一个家族的兴衰，是每个族人所必须敬拜祭扫的。祠堂则是一个家庭组织的中心，它既是供奉祖先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设宴宴饮的地点。闽台民间十分重视修建祖墓和祠堂。俗话说：“一墓二厝”，可见墓比住房还重要。清代福建莆田“凡城中地，祠居五之一。营室先营宗庙，盖其俗然也。”^[11]福建郊区尚干的林氏家庭，族众近万人，大小祠堂不下50座。林氏在台湾为仅次于陈氏的大家族，现分布于台湾各主要聚居地的主要祠堂多达36座。^[12]

闽台民间通过墓祭、祠祭，举族合食、会食，以提高本家庭的声望，敬宗睦族，达到强化家庭的凝聚力与亲和力。早在宋代，“（福）州人寒食春祀，必拜坟下。富室大姓有贍莹田产，祭毕，合族多至数百人，少数十人，因是燕集，序列款昵，尊祖睦族之道也。”^[13]清代台湾不少宗祠“祭于春仲、秋仲之望，又有祭于冬至者。祭则张灯结彩作乐，聚饮祠中，尽日而罢”。^[14]这种祭祖和聚餐，对于和睦族人，沟通血亲感情，增强宗族的群体意识发挥了作用。如建阳《周氏宗谱·卷首》云：“立祭田以为先庙、先茔、蒸尝、忌日之需，三房以次递以供祀事，岁时节序，骨肉团乐，满堂宴笑，则分明而情不狎，恩浓而怨不生，先业庶乎可保，而诸子亦庶克树立矣”。^[15]

闽台许多地方建有乡庙或宗庙等供奉本地方本宗族的保护神，有的还附带供奉祖先的牌位，成为村社或宗族的信仰中心。人们从信奉祖籍神明为纽带，结成较固定的群体，形成一股内聚力，达到互助和联谊。如清代

福建福安甘棠堡内各乡族通过重建朝阳宫，共同供奉华光大帝，使乡族间“秩序有准，一团和气”。^[16]台湾淡水“龙山寺肇自乾隆间，……塑观音大士于座中，所以藉岁时之祭，联桑梓之恭也。当时鸠建钜工，仅晋、南、惠中人者，以泉之贩于淡，唯三邑人往来较数”。^[17]又如道光二十五年《台郡银同祖庙碑》云：“郡城故有‘同营会馆’，岁久而圯，仅存隙地。辛丑，成弁陈青山倡议，劝捐重建。……中堂塑天妃暨吴真人、陈圣王神像。凡同人之来郡者，寓焉；及试期，士子寓者优夥。颜其额曰：‘银同祖庙’，实则‘银同会馆’也。”^[18]

闽台民间每逢神诞日或年节，往往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活动。这对于加强乡族内部的团结，协调各族之间的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如福建永定高东一带的元宵节，一般以宗祠为中心，“请戏班子演戏，动员各坊耍龙灯、舞狮、贴花灯、搭架装烟火，竖杆放鞭炮，大闹三天三夜”。^[19]《斯未信斋杂录》也载：清代天后神诞日，“台人循旧俗，迎嘉邑北港庙中神像至郡城庙供奉，并巡历城厢内外而回。焚香迎送者，日千万计。……神輿出巡，舆夫皆黄衣为百夫长，手执小旗，众皆听其指挥。郡城各庙神像，先皆舁之出迎，复送天后出城而后返。”总之，人们在乡族热烈的迎神赛会活动中，感受到欢乐、温暖与祥和。

除此之外，闽台乡族通过兴办公益事业（如修水利、铺路、架桥、设渡、设茶亭等）、赈济贫穷、办学考试等强化人们宗族乡土意识中的亲和力，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详论。

（二）

闽台宗族乡土观念强烈，其负面作用也不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使各宗族、各地区产生分裂和对立，矛盾和斗争时有发生。甚至造成破坏性极大的械斗。

闽台械斗，不论是宗族械斗还是分类械斗，起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深层次分析，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即强烈的宗族和乡土意识，民俗的强悍和好勇斗狠。有关械斗的根本原因，有的论者以为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如争地、争水、争夺生意等；有的论者以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如吏治的腐败、地方官因循玩忽、办事不分、游手匪徒煽惑、地主集团纷争等酿成。但是这些经济政治上的问题清代至民国时期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而为什么唯独只有福建、台湾、广东、湖南等南方地区械斗现象特别严重，显然，把经济、政治的原因作为根本原因是很难说得通的。

强烈的宗族和乡土观念所产生的排他性，使各宗族

和乡村甚至县省籍之间经常出现相互欺凌和对抗的情况。在闽台民间,每个宗族、乡村或同祖籍聚居地都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彼此之间泾渭分明。每个独立王国的成员,都有维护自己宗族、乡村或聚居地和为之效劳的义务。如果独立王国内某一成员受到损害或与他人发生纠纷,那么整个独立王国的全体成员都要为这一成员撑腰,更何况当整个独立王国的利益或尊严受到损害时,所有成员应挺身而出,不得苟且,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亦在所不惜。陈盛韶在《问俗录》卷3《仙游县》中就指出:“一人成仇,举族为之拦路,酿成朋毆巨案。”一旦族人与外族发生冲突,整个家庭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惠安《骆氏族谱》附记写道:“族人罹外侮者,公同出力,若分心异视,通族摒弃之”。台湾客庄、漳泉之人也是“朋比齐力而自护,小故辄讎然以起,殴而杀人,毁匿其尸”。^[16]更有甚者,“当其(械)斗时,虽翁婿、甥舅不相顾也。事毕,则亲串仍往来如故。谓斗者公事,往来者私情,两不相悖云”。^[17]可见,在闽台人心目中,宗族利益高于其他利益,这是“公事”,连姻亲岳父、舅舅都可以不顾,因为这是“私情”,比“公事”为轻,故当“公而忘私”,义无反顾投入捍卫本族利益的械斗。当漳泉移民迁居台湾初期,宗族社会还未形成之时,乡土观念代替了宗族意识,地缘关系作为移民认同整合的纽带。因此,在分类械斗时表现出“小有不平,一闽人出,众闽人从之;一粤人出,众粤人和之”。^[18]清代后期,台湾宗族社会一旦有所发展,宗族意识超过乡土观念,同治以降,宗族械斗就取代了分类械斗。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各宗族、乡村或同祖籍聚居地之间小至鸡毛蒜皮之事,大至争水争地争夺对当地社会的控制权,都会引发矛盾冲突。并且,这种矛盾冲突由于闽台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往往最终导致用武力来解决,这就是宗族械斗或分类械斗。正如史籍中屡屡提到的:“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众盛,欺压单寒。偶因雀角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大案”。^[19]台湾漳泉、客庄之人,“强悍险急近于秦,遇事蜂起喜斗”;^[20]“一人构其衅,千百持械随”。^[21]以下列举数种比较普遍典型的事例略加说明:

闽台历史上的械斗,最多见的是由于某些鸡毛蒜皮的意气之忿,而酿成大动干戈。如惠安北部柯、庄二姓械斗多年,起因于夫妻吵架,庄姓妻子仗着娘家族大势众,发动众丁上柯家问罪。原意不过虚张声势,为庄姓女儿出一口气,不料柯性不甘示弱,弄假成真,积斗多年。陈、吴两姓的械斗,则因陈姓有一小孩放牛吃了吴

姓菜园的菜而遭到打骂,双方互不相让而酿成械斗,几达百年之久。^[22]台湾的械斗更是如此,据《台案汇录》、《清实录》等统计,台湾较大的20余起械斗中,因偶然小事而引起的就有15起。如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彰化、诸罗地区的漳泉械斗,以一钱而兆衅;道光十二年嘉义县的闽粤械斗,因误牵牛只而引起。

清代和民国时期,闽台因迎神赛会而导致家族、乡族间的冲突,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八闽地方,每见诞妄之徒,或逢神诞,或遇令节,必呼朋引类,旗鼓喧闹,或抬驾闽神,或迎赛土鬼……且若与他迎神相遇,则又彼此争途。稍有不让,群起互殴,反置神驾于道旁,每致滋生事端,身蹈刑法”。^[23]《斯未信斋杂录》载台湾北港天后神诞迎送神像时常也出现互斗。同治初年,台湾云林地区廖、李、钟三姓,也常因同时举行迎神赛会而引起械斗。

闽台乡镇也时有因争夺土地、山场、滩涂、市场等地方权益而发生械斗。如福建“闽江下游的沿江各村,一般都是聚族而居,彼此存在着严格的畛域观念,而‘强欺弱,众暴寡’又成为乡族间普遍的现象。如有浮壅的洲地,在一些‘一姓的大乡’附近,问题还比较简单,只要各房各派都能利益均沾,就可以免除纠纷。如果是小姓或小乡的所在地发现了洲地,那就无可避免地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夺,……如双方势均力敌,往往会酿成械斗。……所谓‘无尸不成洲’,这句话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24]咸丰三年,台湾艋舺下郊人(同安人)为夺取顶郊人(晋江、惠安、南安人)的商业地盘,而发生规模大、战斗激烈、伤亡众多顶下郊拼。^[25]

在闽台械斗中,对抗的双方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往往通过同姓通谱、异族联姓、同乡同籍联合等来寻找自己的同盟。如漳泉一带,“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联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26]有的则从宗族之间联合扩大到乡村与乡村的联合,如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四年,泉州刘、蔡洪都连乡械斗,“刘姓慑于众寡悬殊,势难拒敌。遂邀集十一都全部、塔头、埭边、柯村、高后、埕边、伍堡、丙州、后头、三欧、岑张、湖尾、谢厝街等会帮相助。蔡姓即请型厝、前埔、张塘、柯坑、东石、东埕、后湖、社坛、下丙、瑶厝、塘下、坑口、洋宅和中蔡八乡参战。战斗异常激烈,时间长达六年之久,事始平息”。^[27]台湾的分类械斗则经常以“堆”、“郊”的组织形式,联络同籍人,共同对付敌对的一方。如嘉庆年间,噶玛兰漳籍居民占十分之九,他们“恃众强悍”,侵占泉、粤二籍的部分田地。当矛盾冲

突的时候,“闽、粤头家(按:指地主士绅)即通信于同乡,备预不虞”。^[28]

闽台械斗的影响是严重和长期的,对社会、人民生命财产和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如咸丰三年的顶下郊拼,“攻焚抢掠,日寻干戈,残毁村庄大小七百九十余处。而新庄最为繁盛之区,店舍、民房不下五六千户,概成灰烬”。^[29] 光绪三十四年泉州刘、蔡洪都连乡械斗,“蔓延数百乡,伤毙数百命,焚毁数百家;男妇流离,生灵涂炭”。^[30] 更令人担忧的是,械斗中双方结下的冤仇,辗转报复,数世不休。台湾谢金銮云:“闽之械斗,……徂虞构衅,祸连孙子,殃及乡闾,逾百年不能解”。^[31]

(三)

闽台的宗族乡土意识,其根源是产生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小农经济是以几口之家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小家庭,就其本身来说是脆弱的、不稳定的,自然灾害、战争动乱、租税徭役、瘟疫疾病、养生送死等,都能很容易使之大量破产、消亡。这种个体的、细小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要存在和发展,又需要一些他们无法独自承担的集体活动,如防洪抗旱、救助饥荒、抵御盗匪外敌,以及从事铺路架桥等公共事务。这些活动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集体的组织和管理,甚至需要牺牲个体,成全群体,需要权威乃至暴力。在这种需要下,以血缘、地缘进行认同整合的宗族、乡村、同籍贯,在不同情况下发挥着集体组织的作用。

众所周知,从魏晋南北朝至五代时期,北方由于多次战乱,中原人民源源不断迁入福建。从宋代开始,福建地少人多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到了明清时期更为突出。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人们被迫再次离乡背井,到外地,甚至漂洋过海去谋生,其中一大部分移居一水之隔的台湾。历史上闽台移民的特征,使他们更加注重宗族和乡土意识。在新的移居地,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土著人的对立,为图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和衷共济、团结互助。他们以同姓同宗或同出生地、同方言为联系纽带,使散者聚、疏者亲,凝聚成群体,依靠集体的力量,获得生存。

历史上,中原移民福建和福建移民台湾亦有所不同。从魏晋至唐末五代,中原移民福建多是携家举族而行,如民国《建瓯县志》卷19《风俗》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太平寰宇记》记泉州云:“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从求安堵。”唐末五代,豪门士族,避乱入闽,举族南下,人数可观。如《十国春秋》卷95《闽六》载:“昭武立国,宾至如归。唐衣冠卿士跋涉来奔,若李洵、韩偓、王标、夏侯淑、

王淡、杨承休、王滌、崔道融、王拯、杨赞图、王侗、杨沂丰、归傅懿诸人。”因此,福建聚族而居的习俗古已有之,并十分重视乡族内部的凝聚力与亲和力,强调相互救济、扶助的重要性。“凡我同姓,皆属祖宗一脉所分,贵乎有无相恤,患难相顾,有恩礼以相待,无刻薄以相加”。^[32] 侯官《林氏家乘》规定:“宗族子孙,贫穷必相给,生计必相谋,祸难必相恤,疾病必相扶,婚姻必相助,此家世延长之道也”。^[33]

从明末至清统一台湾之初,由于政府的禁令和渡海的困难,大量移民不得不采取非法手段渡台,很少人能够携带家眷。“男多于女,有村庄数百人而无一眷口者”。^[34] “乡间之人,至四五十岁而未有室者,比比而是。”^[35] 这些单身汉多是通过同乡、同族的关系前往台湾谋生,“台人谓漳、泉曰‘唐山’,称初至者曰‘唐山客’。‘唐山客’之来,或因乡党、或由亲朋,互相援引,或有投宿之处”。^[36] “先至者各主其本郡,后至之人不必资粮也”。^[37] 所以“宗族之亲少,洽比之侣多”^[38],“流寓者无期功强近之亲,同乡并如骨肉矣”^[39]。同乡的人聚居在一起,互相依赖,协力开发。“疾病相扶,死丧相助,棺敛埋葬,邻里皆躬亲之。贫无归,则集众捐囊襄事,虽怪者亦畏议议”。^[40] 同时,这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还要互相保护,防御外来的侵扰。同籍人“朋比齐力而自护”。^[41]

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解除了不许沿海人民私渡台湾的禁令,福建不少人举家迁台。如从《东石玉井蔡氏二房长守庆公派系谱牒》发现,这个人丁不上百的支系谱牒中,乾隆、嘉庆年代去台就有68人,其中十二世蔡世合有8个儿子,都于嘉庆中去台。又如“施世榜有九个儿子在安海,建九房施大厝。乾嘉间,除七房、四房外,全部迁居台湾”。^[42] 这种举家举族迁台的情况,在闽台族谱中时有发现。举家举族迁台,以及原先迁台者人丁的繁衍,使台湾也普遍出现聚族而居、声气联络、互相照应的宗族关系。“台则同居,常至阅世。……有无相通,倾囊亦所不惜”。^[43] “兄弟同居,或至数世。……通有无,济缓急”。^[44]

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运转模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循环往复。僵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上闽台山岭重叠、大海阻隔、交通不便所形成的封闭性,使人们普遍存在着狭隘、保守、自私、本位主义、封闭、排他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意识。这种意识最集中典型的表现就是异姓异乡相仇,大族大乡欺凌小族小乡,极力排斥他族他乡人,矛盾的冲突最终导致械斗的发生。

闽台宗族乡土意识中的亲和力与排他性既相互联系、

相互依赖又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为和平统一祖国大业服务。在现实生活中,同宗同乡概念是相对而言的。一般说来,同祖宗族是最小的组织,当这种同祖宗族人数太少、力量不够时,就扩大到同姓宗族,以致再发生到小姓联宗、异姓联宗。同乡者,同住一乡之谓也。对于同一县城的人,同住同一个自然村之人谓之同乡。但是人们一走出县界,在他乡异地,同乡就自然而然地扩大到同县。一旦出了省,同省人也就成为同乡了。一旦出了国境,人人都是中国人,同属炎黄子孙,这就不仅是同乡,而且成为同宗、同族一家人。正如台湾潘氏宗亲会在举行敬祖恳亲大会上恭颂的敬祖文中所云:“万姓一家,中华之源。种族一体,人类之先。无中无外,一气浑然。念兹祖德,和睦无间。本为同体,何事烽烟!”^[49]中华民族要团结,祖国要统一,这是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注释:

- [1] 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
- [2] 参见《台湾省通志》卷2《氏族篇》,《晋安世谱校正序》,台湾《李氏大族谱·源流》,《兴宁吴氏族谱》,台北新庄《鸿儒蔡氏族谱》等。
- [3] 参见《世界至孝笃亲舜裔总会》会刊,载《谱系与宗亲组织》第1册。
- [4] 《同安县文史资料》第6辑《同安、金门的蔡氏家谱》。
- [5] 《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从村庄地名看晋江县的发展历史》。
- [6] 参见陈正祥《台湾地名之分析》,载《台湾文献》第9卷第3期。
- [7]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5《风俗》。
- [8] 《台湾省林氏宗亲会》,载《谱系与宗亲组织》第2册。

- [9] 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岁时》。
- [10] 《续修台湾府志》卷13《风俗·习尚》。
- [11] 《周氏宗谱·卷首》。
- [12] 民国《甘棠堡琐记》卷上。
- [13] 《淡水厅志》卷15《附录一·文征上》。
- [14] 《台湾南部碑文集成》甲记《台郡银同祖庙碑》。
- [15] 参见《永定文史资料》第7辑《高东江姓海内外裔众祭祀东峰公记盛》。
- [16] [20] [34] [35] [39] [40] [41] 《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 [17] 赵翼《檐曝杂记》卷4《闽俗好勇》。
- [18] [28]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分类械斗》。
- [19] 民国《泉州府志》卷20《风俗》。
- [21] 《陶村诗稿》卷2《游龙目井感赋百韵》。
- [22] 参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庭社会与文化》第120-121页。
- [23] 《福建省例》卷34《杂例》。
- [24]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
- [25] 参见黄启木《分类械斗和械》,载《民俗台湾》第6辑。
- [26] 据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所引《宫中档》刘师恕折。
- [27] [30] 《晋江文史资料》第3辑《都蔡械斗纪略》。
- [29] 《军机处录副》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邵连科等奏。
- [31] 《福建通志台湾府·人物》。
- [32] 莲湖《祖氏族谱》卷1《家训》。
- [33] 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11《家范》。
- [36] 连横《雅言》第110页。
- [37] [43] 《重修凤山县志》卷3《风土志·风俗》。
- [38] 高拱乾《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汉人风俗》。
- [42] 《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安海港与移民迁台》。
- [44] 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6《风俗》。
- [45] 转引自杨国桢、陈支平《闽台家族对炎黄文化的追寻》,载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同祖同根,源远流长》第206页。

责任编辑:包礼祥

On Affinity and Exclusiveness of Clannish Provincialism in Fujian and Taiwan Province

FANG Bao-zhang

(Accounting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strong clannish provincialism among people in Fujian and Taiwan, and is showing affinity by editing pedigree, flaunting *jun wang* and *tang hao*, building ancestral hall and temple, guild hall, offering sacrifices, eating *huishi* altogether, playing receive-Gods game, furthermore to unite, help and protect town folks. There is such a strong exclusiveness as its negative function that splitting and antithesis appear among each clansmen or district, even fight with weapons happens. The clannish provincialism in Fujian and Taiwan originates i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becomes stronger because of emigration in history. Nowadays we should let it serve the great cause of unifying motherland.

Keywords: Fujian and Taiwan; clannish provincialism; affinity; exclusiveness